

高桥鞍的复原及有关问题

田立坤

马鞍是马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保证骑乘者安稳、舒适的功能。高桥鞍是马鞍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除具有本身的功能外，对促进马具整体功能的完备起到了非常特殊的作用。应该予以重视。

一 高桥鞍的产生

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二月，在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与各地推举的贤良、文学“问民间所疾苦”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曰：“古者，庶人贱骑绳控，革鞮皮荐而已。及其后，革鞮牦成，铁镗不饰。”说的是古时只有庶人骑马，而且既没有鞍，也没有勒，控制马只用缰绳，人们穿着皮制的鞋子，马背上仅置一个皮垫，称作鞮，后来才有了用皮革做的鞍和用铁做的衔镗，但是都不加修饰^[1]。“鞍”在先秦文献中是做为地名出现的，而不是马具^[2]。“鞍”做为马具最早出现于《史记》中。汉元年(206)刘邦入汉中，随后即出兵返回关中，定三秦，二年又东击楚，在彭城为项羽所败，逃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3]。刘邦下马所踞之“鞍”当是马鞍无疑。考古发现中的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陶马、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的西汉初陶马背上都是仅有一层薄垫(图一:1)，应该是“鞮”，而不是鞍。由此看来，马鞍的出现诚如《史记》所说，可能就在楚汉相争之际。

汉代的马鞍资料在铜器(图一:2)、画像石上都有反映^[4]。最典型的是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铜马背上的马鞍，呈两端隆起、中间靠前凹陷状，还没有鞍桥，形象具体、真实(图二:4)^[5]。

据《初学记》称：“魏百官各有紫茸题头高桥鞍一具。”因此高桥鞍的出现当不晚于曹魏时期，东汉后期的所谓“镂衢鞍”或“金镂鞍”就是一种高桥鞍。“镂衢鞍”见《初学记》引《三辅决录》曰：“平陵公孙奋富闻京师，梁冀知奋俭悒，以一镂衢鞍遗奋，从贷五千万”^[6]。《后汉书》称平陵公孙奋作扶风士孙奋：“扶风人士孙奋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马乘遗之，从贷钱五千万，奋以三千万与之，冀大怒，乃告郡县，认奋母为其守臧婢，云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资财亿七千余万”^[7]。上引两书所记当是同一件事，“马乘”即“镂衢鞍”。南朝陈·徐陵《骢马驱》诗也有：“白马号龙驹，雕鞍名镂衢”之句。“金镂鞍”见于《古



图一

1. 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陶马背上的“鞞”
2. 河北定县铜车饰上刻画马鞍图
3. 山东滕县东汉画像石上备垂直高桥鞍的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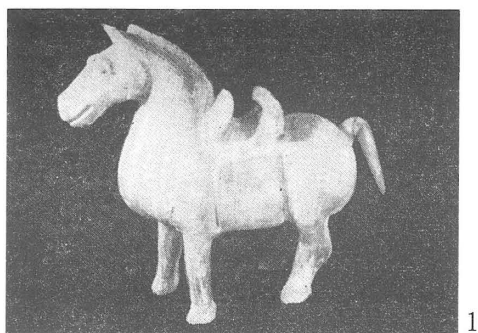
诗为焦仲卿妻作》：“踟躕青骢马，流苏金镂鞍”^[8]。“金镂鞍”有误作“金缕鞍”的^[9]。“镂衢”是侧重于强调雕镂的纹样，“金镂”则是侧重于强调鞍的质地。实际所说的都是金属雕鞍。一般马鞍的装饰都是在鞍桥上，如后面要提到的三燕文化马鞍和辽代马鞍，都是对鞍桥进行精雕细刻，饰以金银。因此，“镂衢鞍”或“金镂鞍”也不例外，它应该是一种有鞍桥的鞍。高桥鞍至迟在东汉末就已经产生了，如山东滕县龙阳店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的马就备有垂直高桥鞍(图一:3)。

二 考古发现中的高桥鞍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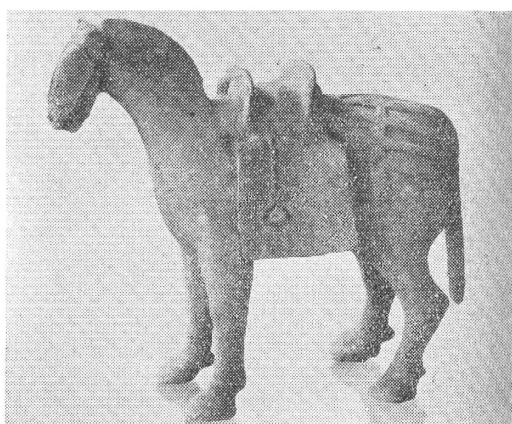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发现的高桥鞍资料大都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

考古发现的备鞍陶马有：河南洛阳晋墓出土的陶马就有备鞍的(图二:1)^[10]。湖南长沙金盆岭永宁二年(302年)M9出土的一釉陶骑俑，所骑之马不仅有鞍，而且在里(左)侧还有一个三角形马镫(图二:3)^[11]。南京象山M7东晋墓出土的陶马上塑有包括鞍桥、双镫在内的全套马具(图二:2)^[12]。广西柳州南朝墓^[13]、辽宁锦州前山三燕文化砖室墓(图二:5)^[14]、陕西咸阳十六国墓(图二:6)^[15]出土的陶马背上也都塑有鞍。上述陶马所备之鞍都是两桥垂直于鞍座，其中除长沙永宁二年陶马鞍为近圆形外，余者都是上宽下窄的拱形，其宽度几与马背同。有将这种高桥鞍称为“两桥垂直鞍”的^[16]。

图画有马鞍形象的见于1964年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那M13出土的纸本“墓主人生活图”上。后桥大于前桥，鞍座与鞍桥用不同的颜色表示，表明不是一体的，质地可能也不同(图版11:4)^[17]。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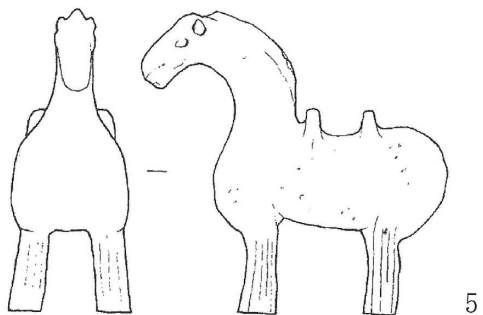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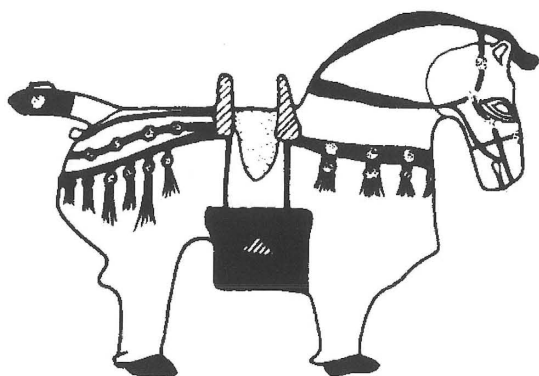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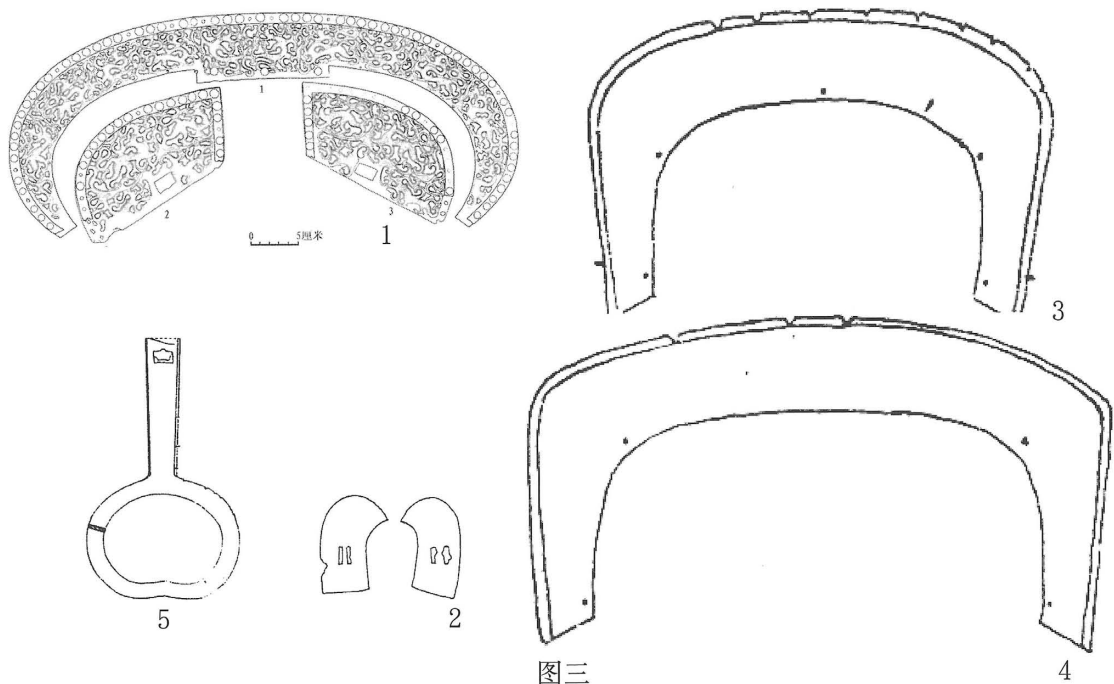
5



6

图二

1. 洛阳晋墓出土的备鞍陶马
2. 象山 M7 出土有鞍的双蹬的陶马
3. 永宁二年墓出土的有鞍的镫的釉陶马
4. 武威雷台汉墓出土备鞍铜马
5. 锦州前山砖墓出土的备鞍陶马
6. 咸阳十六国墓出土的备鞍陶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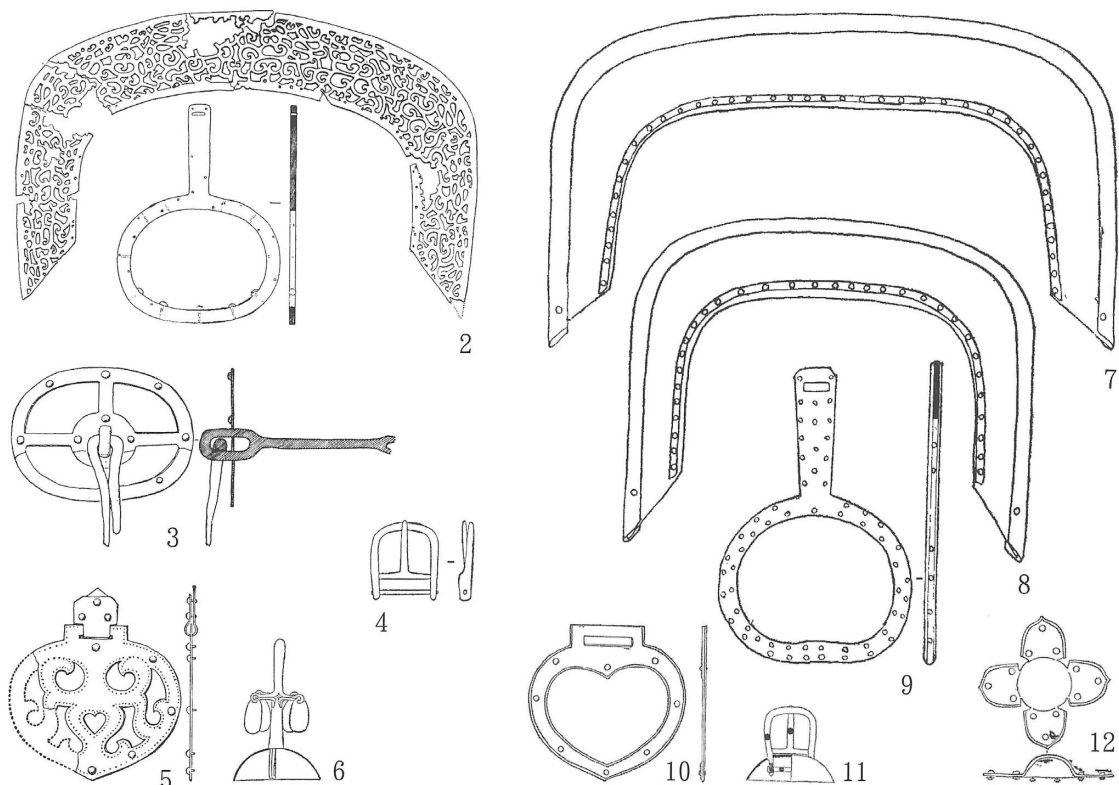
图三

1. 喇嘛洞Ⅱ M101 出土铜鎏金镂空鞍桥包片 2~4. 十二台乡砖厂 88M1 出土铜鎏金素面鞍桥包片 5. 十二台乡砖厂 88M1 出土的长柄板状铜镫

考古发现的马鞍具实物资料有：辽宁北票北沟M8出土有一套铜鎏金马具，其中有鞍桥包片1付2件，木芯外包铜片的长柄镫2件^[18]。朝阳市博物馆征集北票西沟墓地出土铜鎏金镂空鞍桥包片1件，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铜鎏金鞍桥包片1件及翼形片^[19]。辽宁省考古所征集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铜鎏金镂空鞍桥包片1付2件及翼形片^[20]。辽宁省考古所发掘北票喇嘛洞墓地ⅡM101出土铜鎏金镂空鞍桥包片1付2件(图三:1、图版9:1)，ⅡM266出土铁贴金镂空鞍桥包片1付2件(图版10:3)、木芯包铜条镫1付2件及翼形片，ⅡM202出土铁鞍桥包片1付2件(图版10:1·2)^[21]。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发掘朝阳袁台子壁画墓出土木芯包皮革髹漆的鞍桥1付2件、长柄镫2件^[22]。辽宁省考古所发掘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出土铜鎏金马具两套，其中铜鎏金镂空鞍桥包片1付2件、翼形片4件(图版9:2)，铜鎏金素面鞍桥包片1付2件、翼形片2件(图三:2~4)、长柄板状铜镫1件(图三:5)^[23]。朝阳市博物馆征集朝阳三合成墓地出土铜鎏金鞍桥包片1件、木芯马镫包片1件^[24]。中科院考古所发掘河南省安阳孝民屯M154出土铜鎏金鞍桥包片1付2件、翼形片2件及长柄板状铜镫1件^[25]。上述墓葬都属于三燕文化遗存，时代在公元三世纪末至四世纪中叶。

高句丽遗存也有马鞍具实物资料出土，如集安万宝汀M78(图四:1~6)^[26]、七星山M96(图四:7~12)^[27]、桓仁米仓沟将军墓(图版14:6)^[28]，等等。高句丽马具与三燕文化马具属同一系统，发生时代不早于公元四世纪中叶。

综合上面的资料看，这一时期的鞍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前、后桥都垂直于鞍座，二是后桥大于前桥，其宽度几与马背同，三是鞍桥多有或鎏金或镂空的金属包片。



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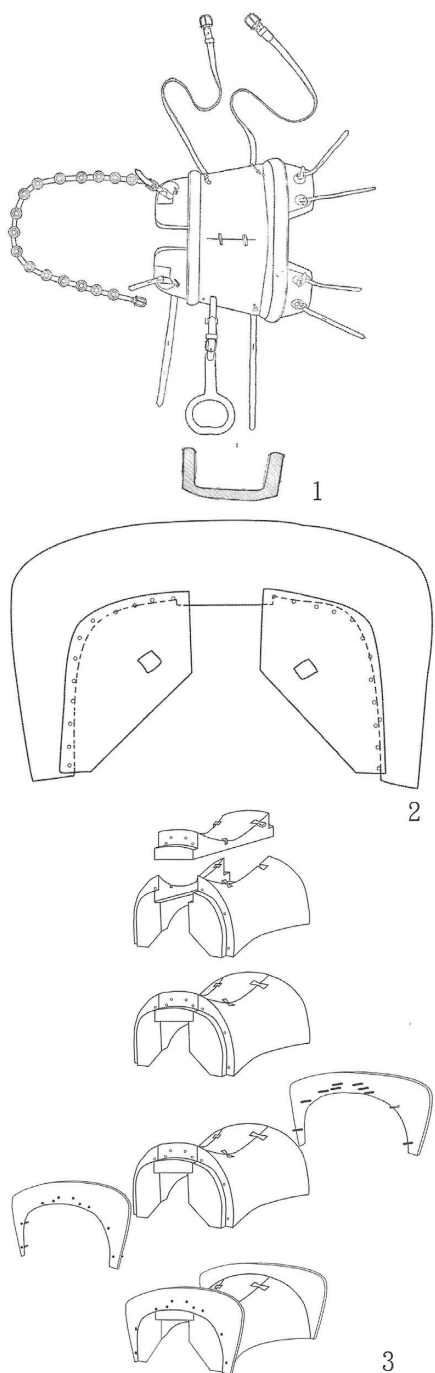
1~6. 集安万宝汀 M78 出土的铜鎏金马具 7~12. 集安七星山 M96 出土的铜鎏金马具

三 高桥鞍的复原

1980年河南安阳孝民屯前燕马具出土后，中科院考古所王振江先生曾根据有限的资料，对M154的马具进行了复原^[29]。其中马鞍由两块鞍座板、前后鞍桥构成。两块鞍座板呈“八”字形用皮革连接，鞍桥与鞍座板用榫卯垂直连接(图五:1)。此后刘永华著的《中国古代车舆马具》在对安阳孝民屯M154和朝阳袁台子壁画墓的马具进行复原时，完全沿袭了王振江先生的做法(图版11:5, 6)^[30]。

由于以往发现的陶马所备之鞍和金属鞍桥包片之类都仅具大概而已，缺乏细部刻划，具体结构不详。所以现在看来，据此复原的马鞍还有很多不合理之处，如用皮革软连接的两块鞍座板的“八”字形夹角不固定，无法保证与鞍桥结为一体，前、后鞍桥内缘与“八”字形鞍座板之间留有空隙，仅靠鞍桥两脚上的榫与很薄的鞍座板垂直连接也不能保证牢固。而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出土的较为完整的鞍桥木芯和铜鎏金包片、翼形片上都保留了表示结构的痕迹，为复原这类高桥鞍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88M1出土了包括有两件鎏金铜镫、两组饰鎏金铜包片的鞍桥、一件铸制的铜板镫在内的成



图五

1. 安阳孝民屯 M154 出土马鞍复原
2. 十二台乡砖厂 88M1 铜鎏金镂孔鞍桥包片和翼形片的结合
3. 十二台乡砖厂 88M1 鞍桥结构复原

套铜鎏金马具。其中一套铜鎏金鞍桥包片雕镂龙凤等纹样，包片内木芯保存尚好，还不见于以往同时期的发现中，具有较高的价值。下面主要依据88M1的鞍具资料，试对高桥型马鞍进行复原。

88M1出土饰铜鎏金镂孔包片的鞍桥由前、后桥槽状包边2件、包片2件、木芯2件，装饰鞍座两端的铜鎏金镂孔翼形片两对4件，共计10件构成。槽状包边用于固定包片与木芯，增加鞍桥的拉力，控制张力；包片饰于前、后桥木芯的正面，既美观华丽，又有加固鞍桥的作用。鞍桥木芯内缘厚2厘米，饰包片的正面平直，里面从中部向外缘渐薄，边缘厚不足1厘米。前桥木芯保存较好，正面外缘沿边钉有小铜钉12枚，内缘沿边布列直径0.6厘米的大透孔10个，其中拱正中并列2个，间距6厘米，有的孔内尚残有木钉。大透孔外布列直径0.3厘米的小钉孔24个，都不是透孔(图版11:1)如将铜包片置于木芯正面之上，上述沿外缘的小铜钉和内缘的小钉孔均被压在下面，并且在包片上也都有与其对应的小孔，可见这种钉、孔都是固定包片和木芯所用，靠近内缘的大透孔则与包片无关，而是为固定鞍桥木芯与鞍座所用。

88M1的两对4件翼形片形状相同，出土时两两相对，一对压在前桥的内缘上，均正面朝上，另一对压在后桥内缘下，均正面朝下。里侧呈“八”字形(图版11:2)，外缘弧度分别与前、后桥内缘弧度一致。如将翼形片置于所属的鞍桥包片内缘上发现，翼形片外缘上的小孔与上述铜包片及木芯内缘上的小孔也一一对应，可见这种翼形片是置于包片上的，外缘与包片内缘重叠，其作用是装饰鞍座两端，以使鞍座与鞍桥浑然一体(图五:2)。

根据上面对铜鎏金鞍桥包片、翼形片和木芯所留痕迹的分析，并参照其它相关资料，对以88M1马鞍为代表的高桥鞍的具体结构和形制作如下复原：

1 马鞍整体由鞍座和前、后鞍桥组合而成。鞍座由两块鞍座板和一块脊板构成，用榫卯固定。脊板的作用既可以固定两块鞍座板之间的“八”字形夹角，又是将鞍桥固定在鞍座上的一个着力点，鞍桥木芯正中两个并

列的透孔和下边的两个孔就是为固定脊板与鞍桥所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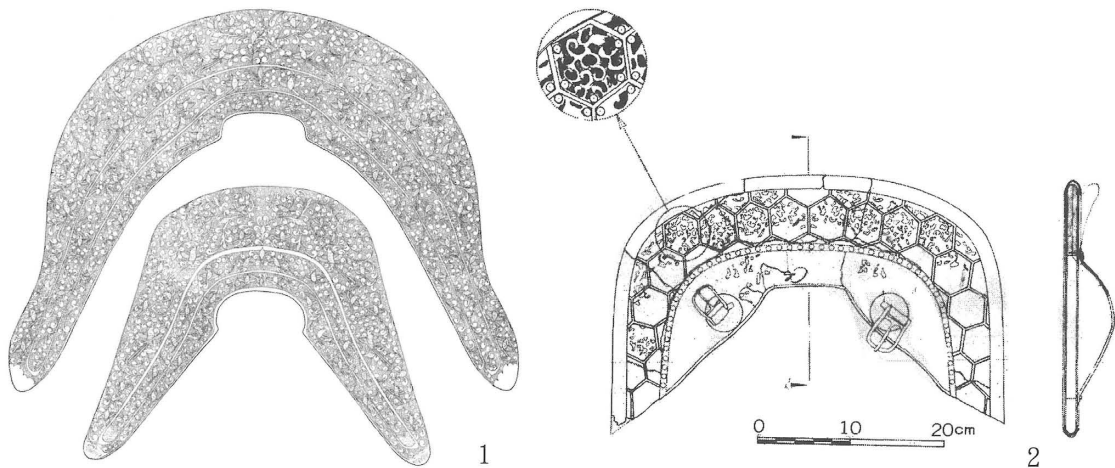
2 鞍座前后两端隆起，外缘与前、后鞍桥木芯内缘弧度相同，但要大于鞍桥木芯内缘，然后裁出与前、后鞍桥木芯内缘大小相等、厚度一致的槽口；鞍座里侧的大小、角度与固定在鞍桥内缘的两翼形片大小及形成的夹角相等。

3 前、后鞍桥垂直纳入鞍座前、后两端槽口内，用木钉与鞍座两端横向连接固定，使鞍桥与鞍座的结合更加牢固(图五:3、图版11:3)。

88M1没有发现鞍座痕迹，但是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鞍座资料比较丰富，以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马背上的铜鞍座最为直观真实。该鞍没有鞍桥，整个鞍子前窄后宽，中部偏前下凹，两端隆起。前后面都是两边略外撇，顶部平直，中部为“八”字形空间。这种鞍座与根据出土的铜鎏金鞍桥包片、翼形片及鞍桥木芯推测的88M1马鞍形制大致相同，只是没有鞍桥而已。南京象山M7等墓出土的陶马背上的鞍前、后桥之间也是下凹，与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铜马鞍座十分相似，可作为88M1马鞍复原的佐证。

四 高桥鞍与镂衢鞍

目前朝阳境内出土的铜鎏金(铁贴金)镂孔高桥鞍鞍桥包片已发表的共有7件(付)，呈上宽下窄拱形的4件(付)，都是以龟背纹为母题，内置龙、凤及骑射等纹样；椭圆形的3件(付)，都是行龙纹。其中以十二台乡砖厂88M1出土的最为完整、精美。88M1鞍桥木芯里侧髹漆，外面饰雕镂龙、凤等纹样的铜鎏金包片。铜鎏金包片的制法是先正面用篆刻的楔形点连贯成所绘纹样，然后将纹样轮廓线以外减地镂空、鎏金，工艺复杂，雕镂精致，异常华美。根据上面的复原可知，以这种铜鎏金镂孔包片、翼形片装饰的马鞍都是两桥高耸，垂直于鞍座，可能就是古代文献中所说的“高桥鞍”。从整体构成上看，这种高桥鞍由鞍座、鞍桥两部分组合而成，形体笨重、



图六

1. 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银鎏金鞍桥包片 2. 韩国庆州天马冢出土的铜鎏金镂孔鞍桥包片

古朴原始；从形制演变上看，这种高桥鞍应是在武威雷台东汉墓铜马那类鞍座上增加前、后鞍桥而成。从使用功能上看，在鞍座上安装前、后两个鞍桥，会使骑乘者更加安稳、舒适，但十分不便于上下。因此我们认为，这种高桥鞍是最原始的有桥马鞍。这种鞍的实物资料虽然在辽西地区发现较多，但是其最初的发生地却不应该在辽西地区，更不会是在北方的草原地区，也就是说不会是慕容鲜卑那些骑马民族发明的。目前在中原地区虽然还没有发现这类高桥鞍的实物，但是正如前面列举的资料所示，在山东省滕县龙阳店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上的双马都备有垂直高桥鞍。西晋以后，在长江流域的长沙、南京，黄河流域的洛阳，关中地区，甚至西北到新疆、西南至广西都有备高桥鞍的陶马和有关资料发现，这种高桥鞍分布范围之广泛说明，它最初应该产生于长江流域或黄河流域。

象武威雷台东汉墓铜马背上那种鞍，人骑上之后，鞍子的露明部分有限，无需加更多的修饰。而“高桥鞍”则不同，前、后桥都暴露于外，需要加以装饰，晚至辽代的马鞍也还都是如此(图六:1)^[31]。因此说，“镂衢鞍”或“金镂鞍”的雕镂部分应集中在鞍桥上，它应该是一种有鞍桥的高桥鞍。考古发现中的三燕文化马鞍，都是属于垂直高桥型，其中饰雕镂龙、凤纹铜鍍金包片、翼形片的，如88M1那种马鞍可能就是文献中的“镂衢鞍”或“金镂鞍”。南朝时又称作“金梁桥鞍”^[32]。

五 高桥鞍与马镫

如88M1那样华丽精美的垂直高桥型马鞍，骑乘时尽管安稳、舒适，但却不便於上马和下马，尤其是宽而高的后桥，更增加了上马的难度，并不实用。因此，要想骑乘装备这种垂直高桥鞍的马，首先要解决如何上马下马的难题。湖南长沙出土的西晋永宁二年陶马身上的单镫挂在左侧腹部，而且骑士的脚也没有踏在镫里。安阳孝民屯M154的单镫，发掘者根据出土位置判断，也是挂在马鞍的左侧。人们习惯于从马的左(里)侧上下马，挂在马左(里)侧的单镫，正是专供人们上下马使用的。因此，孙机先生认为：“也就在这个时期(即高桥鞍产生时期——笔者注)，几乎与高鞍桥定名的同时，我国发明了上马的单镫”，“从这个意义上考虑，可以说我国马镫的发明是以使用高桥鞍为前提”^[33]。这种垂直高桥鞍使用起来十分不便，而且湖南长沙出土的西晋永宁二年陶马、南京象山M7出土陶马上表现的马具都很复杂，与垂直高桥鞍配套的还有很多的装饰，所以这种垂直高桥鞍最初发生时不大可能用来装备骑兵。因此，我们是否还可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测：或许发明马镫的专利既不属于骑马民族，也不属于骑兵。仅我国的骑兵就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更不用说欧亚草原上的骑马民族了，但是他们都没有使用马镫，就是有力的证明。马镫很可能是在中原地区为满足象梁冀、士孙奋那些人骑马的需要而发明的。尤其是那种雕镂精致华美的垂直高桥鞍——“镂衢鞍”，在当时应是价格昂贵的奢侈品，连以“性吝”著名的士孙奋都肯出资三千万，足见其非同一般。所以，绝不是普通人所能用得，更不可能普及到成千上万的骑兵，只能供梁冀、士孙奋那样的人享用。我们不难想象，当时象梁冀、士孙

奋这类人肯定不善骑马，即使用人扶持，在没有镫的情况下，上、下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想骑乘装备“镂衢鞍”的马，就更需要首先解决如何上马、下马的问题，所以专供这些人上下马用的马镫也就呼之即出了。目前在辽西地区发现的年代较早的马镫都与高桥鞍共出，可以作为上述认识的一个旁证。杨泓先生根据各地发现的鞍镫资料早就认为：可能“人们对于完备马具的需求情况是：过着游牧生活的骑马民族并不迫切，而非骑马民族为了掌握骑术，自然更迫切地求助于完备的马具。”^[34]据国外已经发现的资料看，骑马民族在没有发明马镫之前曾经借助于皮革或木质的脚扣上下马^[35]。因皮革和木质都易腐烂而难能保存下来，我国是否有这类脚扣还没有得到证实。单镫的发明或许借鉴了骑马民族的脚扣也未可知。

通过上面的复原、分析、比较，可知以“镂衢鞍”为代表的高桥鞍是为了满足那些不善骑马的人骑马的需要而发明的，并由此直接导致单镫的产生，时间不晚于东汉晚期，地点在中原及以南地区。这种高桥鞍尽管骑乘舒适安稳，又华丽威风，但是并不适用于作战，因此不会应用普及到成千上万的骑兵。到北朝后期，在中原地区这种高桥鞍就被前桥仍然较高、竖直、呈“八”形，后桥变窄、向后倾斜的新型鞍取代了，这种新型鞍的前桥为一“八”形，上马时可以把持，后桥变窄向后倾斜，结构合理，更便于上、下马。公元436年北燕灭亡后，高桥鞍在辽西地区也销声匿迹了。四世纪初高桥鞍即由辽西的前燕传入辽东高句丽，如前面提到的吉林集安万宝汀M78、七星山M96都出土有上宽下窄型铜鎏金鞍桥包片。万宝汀M78鞍桥包片雕镂行龙纹，与北票喇嘛洞II M101铜鎏金镂空鞍桥包片的纹样相同。这种高桥鞍再经高句丽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在新罗、百济、伽耶和日本的古坟中继续流行到七世纪。新罗、百济、伽耶和日本的古坟中都有大量的高桥鞍，包括“镂衢鞍”的发现，如庆州天马冢(图六:2)^[36]和日本的誉田丸山古坟(图版9:3)^[37]、藤之木古坟(图版9:4)^[38]等。

注 释

- [1] 《盐铁论》散不足第二十九。王贞珉《盐铁论译注》269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
- [2] 鲁成公二年，晋败齐于鞞。《春秋左传集解第十二·成公上》6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 [3] 《史记》第二十五留侯世家2039页，中华书局，1959年。
- [4] 中国美术全集编委会：《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8画像石画像砖24页，图二八·双马，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
- [5]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2期。
- [6] 唐·徐坚等：《初学记》卷二十二·鞍第七。
- [7] 《后汉书》梁统传附玄孙冀。
- [8] 《玉台新咏》即作“金缕鞍”，见《四库全书》第1331册643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9] [清]沈德潜《古诗源》卷四“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为“金缕鞍”，中华书局，1963年。
- [10]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

- [11]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
- [12] 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11期。
- [13] 广西梧州市博物馆：《广西苍梧到水南朝墓》，《文物》1981年12期，33页图一六。
- [14] 锦州市博物馆：《锦州市前山十六国墓》，《考古》1998年1期。
- [15]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头道塬十六国墓葬》，《考古》2005年6期。
- [16] 孙机：《唐代的马具与马饰》，《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0年。
- [17] 新疆文物事业管理局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丝路考古珍品》，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 [18] 徐基：《关于鲜卑慕容部遗迹的初步考察》，《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 [19] 田立坤、李智：《朝阳发现的三燕文化遗物及相关问题》，《文物》1994年11期。
- [20] 陈山：《辽宁北票喇嘛洞三燕马具》，《文物》2003年3期。
- [2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4年2期。
- [22]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等：《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6年6期。
- [2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等：《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11期。
- [24] 于俊玉：《朝阳三合成出土的三燕文物》，《文物》1997年11期。
-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6期。
- [26] 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年2期。
- [27]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县两座高句丽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1期。
- [28] 武家昌、梁志龙、王俊辉：《桓仁米仓沟高句丽壁画墓》，《辽宁考古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
米仓沟将军墓已被盗掘，发掘时没有发现马鞍桥及马镫等，但是根据出土应固定在鞍桥上的有帽铜鍱金带扣及其它铜饰件判断，此墓应有马具无疑。
-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术室：《安阳晋墓马具复原》，《考古》1983年6期。
- [30] 刘永华：《中国古代车舆马具》图179、图180，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
- [3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图72，文物出版社，1993年。
- [32] 《初学记》卷二十二·鞍第七：“刘义恭谢金梁鞍启：赐臣以御金梁桥鞍，制作精巧，宜副龙骧，圣慈下逮，猥垂光锡。”
- [33] 同[16]。
- [34] 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1984年9期。
- [35] 齐东方：《中国早期马镫的有关问题》，《文物》1993年4期。
- [36] [韩国]大韩民国文化公报部文化财管理局：《天马冢发掘调查报告书》，光明出版社，1975年。
- [37] [日本]马具大鑑编辑委员会：《日本马具大鑑一·古代上》，日本中央競马会发行，1990年。
- [38] [日本]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斑鳩藤之木古坟概报》，吉川弘文馆，平成元年。

插图出处：

图一：1.《文物》1977年10期29页图二：2，2.《文物》1977年10期，29页图二：3，3.《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8·画像石画像砖，24页图二八

图二：1.《考古学报》1957年1期，图版三：2，2.《文物》1972年11期，40页图三八，3.《考古学报》1959年3期，图版拾贰：3，4.《考古学报》1974年2期，图版捌：2，5.《考古》1998年1期，93页图三：10，6.《考

古》2005年6期，52页图九：9

图三：1.《考古学报》2004年2期，229页图二一，2～4.《文物》1997年11期，27页图二十：1、2、3、5.《文物》1997年11期，25页图一：四3

图四：1～6.《考古》1977年2期124页图二：1、2，125页图三：2、7、8、10，7～12.《考古》1979年1期，30页图六：1、2、3、4、5、18

图五：1.《考古》1983年6期，557页图四，2. 新制，3. 新制

图六：1.《辽陈国公主墓》，图七二：1、2，2.《天马冢发掘调查报告书》，图96

高橋型鞍の復原と関連問題

田立坤

鞍は馬具の重要な構成部分であり、騎乗者の安全性と快適さを保証する機能を備えている。高橋型鞍*は、鞍の発達・変遷過程における重要な節目であり、鞍自体の機能以外に、馬具全体の機能を整えていく上で非常に特別な役割を担っていた。この点を重視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一 高橋型鞍の出現

前漢の昭帝始元六年(紀元前81)二月、丞相の田千秋、御史大夫の桑弘羊、および各地から推挙された賢良と文学による「問民間所疾苦(民の苦しみを聞く)」塩鉄会議の席上で、賢良が言うには、「古、庶人賤騎繩控、革鞞皮荐而已。及其後、革鞍牦成、鉄鑣不飾。」つまり、昔、庶民には馬だけがあり、鞍や轡もなく、馬を御すには繩の手綱だけを用い、人々は革で作った靴をはき、馬の背に鞞と呼ばれる皮の敷布を敷いただけであった。後に、ようやく革で作った鞍や鉄で作った轡を用いるようになったが、いずれも装飾は施されなかった¹。「鞍」については、秦代以前の文献では、馬具でなく地名として記述がある²。馬具としての「鞍」の初見は『史記』である。漢の元年(206)、劉邦は(項羽に)漢中に移封され、その後すぐに挙兵して関中に引き返し、三秦を平定した。漢の二年に再び東征して楚を討ったが、彭城で項羽に敗れ、下邑まで逃げ、「漢王は馬を下り、鞍に腰を落として問う」とある³。この時、劉邦が馬から降りて腰を下ろした「鞍」は、間違いなく馬の鞍である。考古学的発見としては、陝西省の秦始皇帝陵の兵馬俑坑から出土した馬俑や、咸陽楊家湾漢墓で出土した前漢初期の馬俑の背中には、いずれも一枚の薄い敷物だけがある(図一-1)。これは「鞞(下鞍)」のはずで、鞍ではない。このように見ると、鞍の出現は『史記』で述べられているように、おそらく楚と漢が争っていた時期と思われる。

漢代の鞍の資料は、銅器(図一-2)や、画像石の図(図一-3)に見られる⁴。最も典型的なものは、甘肅省武威雷台後漢墓で出土した銅製馬の背にある鞍(図二-4)で、両端が隆起し、中間が前方に凹んでおり、鞍橋(前輪、後輪)はまだないが、形状が写実的である⁵。

『初学記』には、「魏の百官は、それぞれ紫茸題頭の高橋型鞍一式を持っている。」という記述がある。したがって、高橋型鞍は、遅くとも曹魏の時期には出現しており、後漢後期のいわゆる「鏤衢鞍」あるいは「金鏤鞍」こそ、この高橋型鞍の一種である。「鏤衢鞍」については『初学記』が引用する『三輔決録』に「平陵の公孫奮は、その富が都(洛陽)にまで聞こえるほどであった。梁冀は公孫奮が儉約家なのを知り、鏤衢鞍一個を送り、五千万の貸し金とした」⁶と記されている。『後漢書』では平陵の公孫奮を扶風の士孫奮と呼び、「扶風の人である士孫奮は、富貴でありながら吝嗇家であった。そこで梁冀は馬乗を士孫奮に送り、五千万の貸し金としたが、士孫奮は三千万しか出さなかった。梁冀は激怒し、郡県に、士孫奮の母が倉庫番の下女であったと告げ、白色の真珠十斛と、上質の黄金千斤を盗んで逃げた

と偽った。ついに士孫奮の兄弟を捕らえて獄死させ、資財一億七千万余をことごとく没収した」⁷とある。上に引用した二つの史料の記事は同一の事件を記したもので、「馬乗」とは「鍔鞞」のことである。南朝・陳の徐陵の詩『驄馬駟』にも、「白馬は竜駒と号し、彫鞞は鍔鞞と名づく」という句が見られる。また、『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中にも「金鍔鞞」という語が見られ、「逡巡する青い葦毛の馬、房状の飾りが付いた金鍔鞞。」⁸とある。誤って「金鍔鞞」を「金縷鞞」とするものもある⁹。「鍔鞞」は、彫金した文様を強調しており、「金縷」は鞞の材質を強調している。実際に意味するところは、いずれも金属に彫刻を施した鞞である。通常、鞞の装飾は、例えば後述する三燕文化の鞞や遼代の鞞では、いずれも鞍橋(前輪・後輪の鞍金具)に精緻な彫刻を施し金銀で装飾されているように、全て鞍橋に施される。つまり「鍔鞞」や「金鍔鞞」も例外でなく、それは鞍橋のある鞞のはずである。山東省滕県龍陽店で出土した後漢時代の画像石に見られる馬(図一-3)には、垂直高橋型鞞が備わっているように、高橋型鞞は遅くとも後漢の末には出現していた。

二 考古学的発見における高橋型鞞の資料

現在のところ、全国で発見された高橋型鞞は、大部分が両晋南北朝時代のものである。

考古学調査によって発見された鞍付の馬俑には、以下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る。河南省洛陽晋墓で出土した馬俑(図二-1)には鞍が付いている¹⁰。湖南省長沙金盆嶺永寧二年(302年)M9号墓から出土した単彩騎馬俑(図二-3)には、騎乗している馬に鞍があるだけでなく、内(左)側に、三角形をした鐙がある¹¹。南京象山M7東晋墓で出土した馬俑(図二-2)には、前輪・後輪、左右の鐙を含む馬具一式がある¹²。広西省柳州南朝墓¹³、遼寧省錦州前山三燕文化磚室墓¹⁴(図二-5)、陝西省咸陽十六国墓¹⁵(図二-6)で出土した馬俑の背にも、すべて鞍がある。上述したこれらの馬俑に見られる鞍は、全て両輪が居木に対して垂直であり、そのなかで、長沙永寧二年墓の馬俑の鞍がほぼ円形に近いのを別にするると、残り全ての鞍は、上部が広く下部が狭いアーチ形を呈しており、その幅は馬の背幅と同じである。こうした高橋型鞍を「両輪垂直鞍」と言う¹⁶。

鞍の形が描かれた図は、1964年新疆トルファン市アスターナM13で出土した紙本「墓主人生活図」に見られる。後輪が前輪より大きく、居木と鞍橋を異なる色で表示し、一体ではないことを示しており、おそらく、素材も同じではない¹⁷(図版11-4)。

考古学調査によって発見された鞍の実物資料としては、以下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る。遼寧省北票北溝M8では金銅製馬具一式が出土し、そのなかに鞍金具1組2点と木心銅張長柄輪鐙2点¹⁸がある。朝陽市博物館は、北票西溝墓地で出土した金銅製透彫鞍金具1点と北票喇嘛洞墓地で出土した金銅製鞍金具1点及び磯金具を収集した¹⁹。遼寧省文物考古学研究所は、北票喇嘛洞墓地で出土した金銅製透彫鞍金具1組2点及び磯金具を収集した²⁰。また、同研究所は、北票喇嘛洞墓地ⅡM101で金銅製透彫鞍金具1組2点(図三-1、図版9-1)、ⅡM266で鉄地金張透彫鞍金具1組2点(図版10-3)、木心銅張輪鐙1組2点及び磯金具、ⅡM202で鉄製鞍金具1組2点(図版10-1・2)を発掘した²¹。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は、朝陽袁台子壁画墓で木心漆塗皮革張鞍金具1組2点、長柄鐙2点を発掘した²²。遼寧省考古学研究所は朝陽十二台郷磚廠88M1において金銅製馬具2組を発掘し、そのなかに金銅製透彫鞍金具1組2点、磯金具4点(図版9-2)、金銅製無文鞍金具1組2点、磯金具2点(図三-2~4)、長柄銅輪鐙1点(図三-5)がある²³。朝陽市博物館は、朝陽三合成墓地で出土した金銅製鞍金具1点、木心鐙金具1点を収集し

た²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は、河南省安陽孝民屯M154で金銅製鞍金具1組2点、磯金具2点及び長柄銅輪鐙1点を発掘した²⁵。以上の墓葬は全て三燕文化の遺跡であり、年代は西暦3世紀末から4世紀中葉と考えられる。

高句麗の遺跡からも鞍具の実物資料が出土している。例えば集安万宝汀M78²⁶(図四-1~6)、七星山M96²⁷(図四-7~12)、桓仁米倉溝將軍塚²⁸(図版14-6)などがある。高句麗の馬具は三燕文化の馬具と同じ系統に属し、出現した年代は西暦4世紀中葉以降と考えられる。

以上の資料から総合的に見て、この時期の鞍具には3つの顕著な特徴が見られる。第一点は、前・後輪がいずれも居木に対して垂直であること。第二点は後輪が前輪よりも大きく、その幅が馬の背幅と同じである。第三点は、前輪・後輪には鍍金や透彫を施した鞍金具が多いことである。

三 高橋型鞍の復原

1980年、河南省安陽孝民屯で前燕期の馬具が出土した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の王振江氏は、限られた資料をもとにM154の馬具を復原した²⁹。そのうち鞍は、2枚の居木と前輪・後輪から構成されている。2枚の居木は「八」の字型に皮革で連結されており、鞍橋と居木は柄を使って垂直に連結してある(図五-1)。この後の、劉永華の著した『中国古代の車輿馬具』では、安陽孝民屯M154と朝陽袁台子壁画墓の馬具復原に際しては、完全に王振江氏の復原を踏襲している³⁰(図版11-5・6)。

これまで発見された馬俑に見られる鞍や金属製鞍金具は、いずれもおおよそのものに過ぎないばかりか、細かい部分が欠如しており、具体的な構造が明らかではない。したがって、これに基づいて復原された鞍を見ると、まだ多くの矛盾点がある。例えば、皮革で弱く連結された2枚の居木の「八」字形の夾角が固定されておらず、鞍橋と一体化して連結する保証がない。前輪・後輪の内縁と「八」字形の居木の間には隙間が残っており、ただ前輪・後輪の根本にある柄を薄い居木に垂直に連結しているだけで、堅牢さは保証されない。その点、朝陽十二台郷磚廠88M1から比較的完全な形で出土した前輪・後輪の木心と金銅製鞍金具、および磯金具には、いずれも構造を示す痕跡が残っており、この種の高橋型鞍を復原する上で重要な根拠となった。

88M1で出土したのは、金銅製鐙2点、金銅製鞍金具2組、鑄銅製鐙1点を含む金銅製馬具一式である。そのうち一組の金銅製鞍金具には、龍や鳳凰等の文様が施され、木心の保存状態が良好で、これまでに発掘された同時代のものに見られない高い価値がある。以下、主に88M1の鞍の資料に基づき、高橋型鞍の復原を試みる。

88M1で出土した金銅製透彫鞍金具は、前・後輪の覆輪2点、海金具2点、木心2点、居木の両端を飾る金銅製透彫磯金具2組4点の、計10点で構成されている。覆輪は海金具を木心と固定するのに用い、鞍橋の引っ張る力を補強して鞍としての張力を制御する。鞍金具は前・後輪の木心の表面を飾り、美観だけでなく鞍橋を補強する機能も備えている。鞍橋木心の内縁の厚さは2cmで、海金具で飾る表面は平らで、裏面は中から外縁に向かって次第に薄くなり、外縁の厚さは1cmに満たない。前輪の木心は保存状態が比較的良好で、表面外縁に沿って小さな銅釘12本があり、内縁に沿って直径0.6cmの大きな貫通孔が10個並ぶ。そのうち、中央の2個は6cmの間隔で並んでおり、木釘が残存している穴もある。大きな貫通孔以外に、直径0.3cmの小さな釘孔が24個並んでいる。いずれも貫通しておらず(図版11-1)、海金具を木心表面に置くと、上述した外縁に沿った小さな銅釘と内縁の小さな釘孔は、いずれもその下

になり、また、海金具にも全てこれらに対応する小さな穴がある。こうした釘や孔は、いずれも海金具と木心を固定するためのもので、内縁に近い大きな貫通孔は、鞅金具とは関係なく、鞍橋木心と居木を固定するために用いられたと考えられる。

88M1の2組4点の磯金具は形状が同一で、それぞれ対になった状態で出土した。1組は前輪の内縁の上に押しかぶさる形で、いずれも表面が上向きとなり、もう1組は後輪の内縁の下に押しつけられる形で、いずれも表面が下向きになっていた。内側は「八」字形をしており(図版11-2)、外縁の弧はそれぞれ前・後輪の内縁の弧と一致する。磯金具を対応する海金具の内縁に置いてみると、磯金具の外縁上の小孔が、上述した海金具および木心内縁上の小孔と一つ一つ対応しており、明らかにこの種の磯金具が海金具の上に付けられたものであり、磯金具の外縁は海金具の内縁と重なるのである。居木の両端を飾る機能ももち、それによって、居木と鞍橋が渾然一体となっている(図五-2)。

上記の金銅製海金具、磯金具および木心に残された痕跡の分析に基づき、その他関連資料を合わせて参照して、88M1の鞍を代表とする高橋型鞍の具体的構造と形状や作りについて、以下のように復原した。

- 1 鞍全体は、居木と前輪・後輪の組み合わせで構成される。居木は2枚の居木板と1枚の背板から成り、柄で固定する。背板の機能は、2枚の居木板の間の「八」字形の夾角を固定するだけでなく、鞍橋を居木上の力点に固定させる働きもする。また鞍橋木心の中央部に2つ並んだ貫通孔と、下部の2つの孔は、背板と鞍橋を固定するために用いられる。
- 2 居木の前後の両端は隆起しており、その外縁と前後の鞍橋木心の内縁の弧は同じであるが、鞍橋木心の内縁より少し大きくする必要があり、その後、鞍橋木心の内縁と大きさや厚さが一致する溝を設ける。居木端面の大きさと角度は、鞍橋の内縁に固定した二つの磯金具の大きさ、および磯金具が形成する夾角と等しくなるようにする。
- 3 前輪・後輪は居木の前後両端の溝に垂直に嵌め込み、居木の両端に横向きに木釘を打って連結固定させ、鞍橋と居木の結合をより強固にする(図五-3、図版11-3)。

88M1では居木の痕跡が発見されなかったが、これまでの考古学的発見に、居木の資料は比較的豊富にあり、甘肅省武威雷台後漢墓で出土した銅製馬の背にある銅製居木が最も写実的である。この鞍には鞍橋がなく、鞍全体は前が狭くて後は広く、中央部やや前寄りがくぼみ、両端が隆起している。前後の両端面がいずれもやや外向き、頂部は水平、中ほどは「八」字形を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な居木は、出土した金銅製海金具・磯金具、鞍橋の木心に基づいて推定復原した88M1の鞍とほぼ同じで、ただ鞍橋がないだけである。南京象山M7などの墳墓から出土した馬俑の背にある前輪と後輪の間もくぼんでおり、武威雷台後漢墓から出土した銅製馬の居木とも似ており、88M1鞍の復原の根拠となる。

四 高橋型鞍と鏤衢鞍

現在、朝陽地域で出土した金銅製(鉄地金張)透彫高橋型鞍金具は、既に7点(組)が発表されている。上部が広く下部が窄まったアーチ型のものが4点(組)で、いずれも亀甲文を下地とし、その内部に龍、鳳凰、騎射等の文様が施されている。楕円形は3点(組)で、いずれも行龍文(爬龍文)である。そのなかで、十二台郷磚廠88M1で出土した鞍金具が、最も完全な形を残していて精巧で美しい。この88M1の鞍橋は、木心の内側に漆が塗られ、外側は龍や鳳凰等の文様を彫った金銅製鞍金具で装飾されている。金

銅製鞍金具の製作方法は、先ず表面にタガネで楔形の点を連続して打ち込んで(蹴彫)文様を描き、その後、文様の輪郭以外の部分を透彫にして切り取り、鍍金するという複雑な技法で、彫金は精緻でとても美しい。上記の復原から分かることは、こうした金銅製透彫海金具や磯金具で装飾された鞍は、いずれも両輪が居木に垂直に据えられ、高く立ち上がっていて、おそらく、これこそが古代の史料に記載されている「高橋鞍」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全体の構成から見ると、こうした高橋型鞍は、居木と前輪・後輪の鞍橋からなり、嵩張って重く、古代の質朴さがある。形状・構造上の変遷から見れば、このような高橋型鞍は、武威雷台後漢墓の銅製馬の居木の前後に、前輪・後輪を加えてできたものである。機能的に見ると、居木の前後に前輪・後輪を取付けると、騎乗者はより安定して快適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が、乗り降りに不便である。このため筆者等は、こうした高橋型鞍こそ最古の前輪・後輪をもつ鞍であったと考える。この種の鞍の実物資料は、遼西地区で比較的数多く発見されているが、最初の出現地は遼西地域ではなく、まして北方の草原地方であるはずがない。つまり、慕容鮮卑などの騎馬民族が発明したとは考えられないのである。現在までのところ、中原地域でこうした高橋型鞍の実物は、発見されるに至っていないが、先に列挙した資料が示すように、山東省滕県龍陽店で出土した後漢時代の画像石に見られる2頭の馬には、垂直高橋型鞍が備わっている。西晋時代以降では、長江流域の長沙、南京、黄河流域の洛陽、関中地区、さらに北西は新疆、南西は広西などで、いずれも高橋型鞍のある馬俑や関連資料が発見されていて、このような高橋型鞍の広範囲な分布は、その最初の出現地が、長江流域あるいは黄河流域であることを物語っている。

武威雷台後漢墓で出土した銅製馬に見られるような鞍の場合は、人間が騎乗すると鞍の露出部分が限られ、多くの装飾を加える必要はなかった。しかし「高橋型鞍」はそれとは違って、前後の鞍橋が全て外部に露呈するので装飾を加える必要がある。遼代に至っても、鞍はまだ全てこのようで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³¹(図六-1)。こうしたことから、「鏤衝鞍」あるいは「金鏤鞍」は、その彫金部分が前輪・後輪に集中しているはずであり、また、鞍橋の付いた一種の高橋型鞍であったはずである。考古学的発見における三燕文化の鞍は、すべて垂直高橋型鞍に属し、そのうち龍、鳳凰の文様が彫金された金銅製海金具や磯金具の鞍は、88M1の鞍のように文献に記載されている「鏤衝鞍」あるいは「金鏤鞍」と考えられる。これらは、南朝時代には「金梁橋鞍」とも呼ばれた³²。

五 高橋型鞍と鐙

88M1のように華麗で精緻な垂直高橋型の鞍は、騎乗時には安定して快適であるが、乗り降りの時には不便である。特に幅が広く高い後輪は、乗馬に際し困難さが増して非実用的である。このため、垂直高橋型鞍を装着した馬に乗ろうと思えば、まずどうやって乗り降りするかという難題を解決する必要があった。湖南省長沙で出土した西晋永寧二年の馬俑には、単鐙が左腹部にかかっているが、騎手は鐙に足を入れていない。安陽孝民屯M154の単鐙の場合も、発掘者が出土位置から考えて、やはり鞍の左側にかかっていたと判断した。人々は馬の左側から乗り降りするのが習慣で、左側にかけられた単鐙は、まさに人々が馬に乗り降りするために使用されたのである。このため、孫機氏は「この時期(すなわち高橋型鞍が出現した時期 - 筆者注)になって、およそ高鞍鞍という名が付くのとほとんど同時に、中国で乗馬用の単鐙が発明され」、「この意味から考えると、中国の鐙の発明は、高橋型鞍の使用が前提であったといえる」³³と述べている。この垂直高橋型鞍は使用するのに不便であること、また湖南長沙で出

土した西晋永寧二年の馬俑や南京象山M7で出土した馬俑に表された馬具はいずれも複雑で、垂直高橋型鞍と組み合わせて数多くの装飾が見られることから、こうした垂直高橋型鞍が最初に出現した時は、騎兵の装備に用いられたと考え難い。そこで、次のような大胆な推測はできないであろうか。もしかすると、鐙の発明は騎馬民族でもなければ騎兵でもないかもしれない。中国の騎兵は既に数百年の歴史があり、ユーラシア大陸の草原の騎馬民族は、さらに言うまでもなく、ただし彼らは鐙を使用しなかったという事実が、上記の推測の有力な証拠である。鐙は、おそらく中原地区の梁冀、士孫奮といったような人達が馬に乗るために発明されたのであろう。特に彫金が精緻で美しい垂直高橋型鞍——「鏤衢鞍」は、当時、高価な贅沢品であったに違いなく、「吝嗇な性格」で有名だった士孫奮さえ三千万を出したというのは、尋常一様のもものではなかったことが分かる。従って庶民が使用できるものではなく、何千何万もの騎兵に普及するものでもありえない。ただ梁冀、士孫奮といった人だけが愛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であろう。当時、梁冀、士孫奮のような人は、乗馬が不得手で、たとえ人の助けを借りたとしても、鐙がない状況では、馬の乗り降りも容易ではなかったであろうことは想像に難くない。また「鏤衢鞍」を装着した馬に乗りたければ、さらに、先ずどうやって馬に乗り降りするかを解決する必要があるであろう。したがって、こうした人達が馬に乗り降りするために鐙が現われたと考えられる。現在、遼西地区で発見された比較的古い時期の鐙は、いずれも高橋型鞍と共に出土しており、上述した認識の1つの傍証としうるのである。楊泓氏は各地で発見された鞍や鐙の資料をもとに、おそらく「装備の整った馬具に対する人々の欲求については、遊牧生活をしてきた騎馬民族にとっては切迫したものではないが、非騎馬民族は乗馬技術を習得するために、自然と完備した馬具を切実に求めるようになった」³⁴と早くから考えていた。国外で発見された資料を見ると、騎馬民族は鐙が発明される前に、既に皮革や木製の脚掛けを用いて馬の乗り降りをしていた³⁵。皮革や木材は腐蝕しやすく、保存が難しいので、中国でこうした脚を掛けるものがあつたかどうかの確証はない。単鐙の発明は、騎馬民族の脚掛けを手本にしたのかどうか不明である。

上述の復原、分析および比較を通して、「鏤衢鞍」に代表される高橋型鞍は、乗馬が不得手な人が馬に乗り降りするために発明され、それは同時に単鐙の出現をもたらし、その時期は遅くとも後漢後期で、地域は中原及び中原以南であったことが分かる。このような高橋型鞍は乗馬には快適で安定性があり、豪華で風格もあったが、戦闘には適していなかったため、何千何万もの騎兵に普及するはずもなかった。北朝後期になって、中原地区では、高橋型鞍は、前輪は依然として比較的高く、垂直で、「∧」形を呈し、後輪は幅が狭くなり後方に傾斜した新型の鞍に取って代わられた。こうした新型の鞍の前輪は「∧」形で、乗馬の際に握ることができ、また後輪は幅が狭くなり後方に傾斜しているのは、合理的な構造であり、馬の乗り降りがしやすくなった。西暦436年に北燕が滅亡した後、高橋型鞍は遼西地区においても姿を消した。4世紀初頭、高橋型鞍は遼西の前燕から遼東の高句麗に伝来し、前述した吉林省集安万宝汀M78、七星山M96で、上部が広く下部が狭い金銅製鞍金具が出土した。万宝汀M78の鞍金具には行龍文(爬龍文)が彫られ、北票喇嘛洞ⅡM101の金銅製透彫鞍金具の文様と同じであった。こうした高橋型鞍は、さらに高句麗を経て朝鮮半島と日本列島にもたらされ、新羅、百濟、伽耶そして日本の古墳において、7世紀まで持続的に流行した。新羅、百濟、伽耶そして日本の古墳では、大量の高橋型鞍が発見されており、そのなかには、例えば慶州天馬塚³⁶(図六-2)や日本の誉田丸山古墳³⁷(図版9-3)、藤ノ木古墳³⁸(図版9-4)などの「鏤衢鞍」も含まれる。

註

- 1 『塩鉄論』散不足第二十九。王貞珉『塩鉄論訳注』269頁。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
- 2 魯成公二年、晋、鞍ニ於イテ齊ニ敗ル。『春秋左伝集解第十二・成公上』64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 3 『史記・留侯世家第二十五』2039頁。中華書局、1959年。
- 4 中国美術全集編委会：『中国美術全集』絵画編18画像石画像磚24頁図二八双馬、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年。
- 5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雷台漢墓」『考古學報』1974年2期。
- 6 唐・徐堅等：『初學記・卷二十二・鞍第七』。
- 7 『後漢書・梁統伝組玄孫冀』。
- 8 『玉台新詠』には「金縷曲」とある。『四庫全書』参照。第1331冊643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9 [清代]沈德潛の編による歌集『古詩源』には「金鍍鞍」とする。中華書局、1963年。
- 10 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第二隊：「洛陽晋墓の発掘」『考古學報』1957年第1期。
- 11 湖南省博物館：「長沙西晋南朝隋墓発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第3期。
- 12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簡報」『文物』1972年第11期。
- 13 広西梧州市博物館：「広西蒼梧到水南朝墓」『文物』1981年12期、33頁図一六。
- 14 錦州市博物館：「錦州市前山十六国墓」『考古』1998年1期。
- 15 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咸陽頭道塬十六国墓葬」『考古』2005年第6期。
- 16 孫機：「唐代的馬具与馬飾」『中国古輿服論叢』文物出版社、1990年。
- 17 『新疆維吾爾自治区—丝路考古珍品』上海訳文出版社、1998年。
- 18 徐基：「関于鮮卑慕容部遺迹的初步考察」『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 19 田立坤、李智：「朝陽発現の三燕文化遺物及相關問題」『文物』1994年第11期。
- 20 陳山：「遼寧北票喇嘛洞三燕馬具」『文物』2003年第8期。
- 21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票喇嘛洞墓地発掘報告」『考古學報』2004年第2期。
- 22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隊等：「朝陽袁台子東晋壁画墓」『文物』1986年第6期。
- 23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博物館等：「朝陽十二台鄉磚廠88M1発掘簡報」『文物』1997年第11期。
- 24 于俊玉：「朝陽三合成出土の三燕文物」『文物』1997年第11期。
-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孝民屯晋墓発掘報告」『考古』1983年第6期。
- 26 吉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吉林集安的兩座高句麗墓」『考古』1977年2期。
- 27 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县兩座高句麗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1期。
- 28 武家昌、梁志龍、王俊輝：「桓仁米倉溝高句麗壁画墓」『遼寧考古文集』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年。米倉將軍塚は既に盗掘され、発掘時に馬の鞍金具や鐙等は発見されなかったが、鞍橋上で固定する有帽金銅製絞具(鞍金具)及びその他の銅飾金具が出土していることから、この墓に馬具があったことは疑問の余地はない。
-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技術室：「安陽晋墓馬具復原」『考古』1983年第6期。
- 30 劉永華：『中国古代車輿馬具』図179、図180、上海辞書出版社、2002年。
- 3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館：『遼陳国公主墓』図72、文物出版社、1993年。
- 32 『初學記・卷二十二・鞍第七』：「劉義恭、金梁鞍を謝す：(皇帝)御金梁橋鞍を以て臣に賜る。製作精巧にして、龍馬に適う。夥しき慈しみを垂れ給ひ、臣、面目これに優るなし。」
- 33 註16。
- 34 楊泓：「中国古代馬具的發展和対外影響」『文物』1984年第9期。
- 35 齊東方：「中国早期鐙の有關問題」『文物』1993年第4期。
- 36 大韓民国文化公報部文化財管理局：『天馬塚発掘調査報告書』光明出版社、1975年。
- 37 馬具大鑑編輯委員会：『日本馬具大鑑一・古代上』日本中央競馬会発行、1990年。
- 38 奈良県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斑鳩藤の木古墳概報』吉川弘文館、1989年。

* 前輪と後輪が高い鞍を指す。日本語に対応する用語がないため、ここでは高橋型鞍としておく。

【図出典】

- 図1-1：咸陽楊家湾漢墓出土馬俑の「鞵」『文物』1977年10期、p.29、図二、2。1-2：河北定県銅車飾の刻画馬鞍図『文物』1977年10期、p.29、図二、3。1-3：山東滕県後漢画像石の垂直高橋型鞍付の馬『中国美術全集』絵画編18・画像石画像磚、p.24、図二八。
- 図2-1：洛陽晋墓出土鞍付馬俑『考古学報』1957年1期、図版三、2。2-2：象山M7出土鞍付双蹬付馬俑『文物』1972年11期、p.40、図三八。2-3：永宁二年墓出土鞍付鍔付秣馬俑『考古学報』1959年3期、図版十二、3。2-4：武威雷台漢墓出土鞍付銅馬『考古学報』1974年2期、図版八、2。2-5：錦州前山磚墓出土鞍付馬俑『考古』1998年1期、p.93、図三、10。2-6：咸陽十六国墓出土鞍付馬俑『考古』2005年6期、p.52、図九：9。
- 図3-1：喇嘛洞ⅡM101出土金銅製透彫鞍金具『考古学報』2004年2期、p.229、図二一。3-2～4：十二台郷磚廠88M1出土金銅製無文鞍金具『文物』1997年11期、p.27、図二十、1・2・3。3-5：十二台郷磚廠88M1出土長柄板状銅鍔『文物』1997年11期、p.25、図一四、3。
- 図4-1～6：集安万宝汀M78出土金銅製馬具『考古』1977年2期、p.124、図二、1・2、p.125、図三、2・7・8・10。4-7～12：集安七星山M96出土金銅製馬具『考古』1979年1期、p.30、図六、1、2、3、4、5、18。
- 図5-1：安陽孝民屯M154出土鞍の復原『考古』1983年6期、p.557、図四。5-2：十二台郷磚廠88M1出土金銅製透彫鞍金具の海金具と磯金具の結合(新規作成)。5-3：十二台郷磚廠88M1鞍橋構造復原(新規作成)。
- 図6-1：遼陳国公主墓出土金銀製鞍金具『遼陳国公主墓』、図七二、1・2。6-2：韓国慶州天馬塚出土金銅製透彫鞍金具『天馬塚発掘調査報告書』、図96。